

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

主编 谈 敏

新中国会计思想史

陈信元 金 楠 著

图书馆

092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

新中国会计思想史

陈信元 金楠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会计思想史/陈信元,金楠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7

(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

ISBN 7-81049-319-1/F·267

I. 新… II. ①陈… ②金… III. 会计-思想史-中国-1949~ IV. F2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35498 号

XINZHONGGUO KUAJJI SIXIANGSHI

新中国会计思想史

陈信元 金楠 著

责任编辑 江玉 封面设计 未名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上海印刷七厂一分厂装订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6.25 印张 162 千字

印数 0 001—3 000 定价:14.00 元

总序

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就像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历史一样,走过了漫长、曲折而又生生不息的道路。其中既有不断丰富着经济思想宝库的光辉成就,也有阻滞社会经济进程的陈腐落后观念,更有体现了从逆境中奋起的坚韧和创新精神。我国数千年来未曾间断过的历史记载(包括地上文献史料和地下考古文物部分),经过一代代前辈学者的发掘、爬梳和整理,并与国外大致相同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后表明,在 17 世纪以前,大体上也就是在清朝康熙年代以前的约三千年间,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水平一直

处于世界经济思想的前列,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可是,同样的研究也表明,自 17、18 世纪起,中国经济思想就整体而言,开始日益落后于世界水平。这一颓态,尽管不能阻挡 20 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趋势,但从缺乏原创性的经济研究成果来看,毕竟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在经济思想领域,为扭转这种持续达二三百年的颓势创造了条件。依此而论,新中国经济思想与此前的旧中国经济思想相比,无论这里所谓旧中国是从自古以来的广义而言还是从近代以来的狭义来说,都不仅意味着历史分期上的根本区别,而且标志着思想内涵上的重大变化。

新中国的经济思想,至今已有 50 年的历史。在这 50 年中,经济思想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如果根据这种发展的阶段性质粗略地划分一下,大致可以区分为以下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新中国的建立到 60 年代中后期,这是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摸索如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经济建设的最初尝试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曾涌现出不少真知灼见;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环境中,只能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实践和理论作为效法对象,从而也滋长了盲目模仿和搬弄教条的倾向。

第二个时期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经济思想的发展遭受极大损害因而基本上处于停滞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对于我国经济思想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大的两种倾向,都被推到了极端。一种倾向是重视革命斗争,轻视经济建设。

本来,在经历了反对旧社会统治的长期革命斗争之后,新中国的建立已经为把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奠定了基础,然而所谓文化上的“大革命”,却以阶级斗争为纲,再次将经济建设置于次要或服从的地位。经济建设姑且如此,遑论经济思想。另一种倾向就是从现成教条出发而导致的思想僵化。当一切鲜活的经济事物都试图用统一的条条框框来加以解释和进行规范时,经济思想发展的生命力也就停止了。

第三个时期以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仍在生机勃勃的发展过程中。这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和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效途径的新的尝试时期。这种新的尝试,崇尚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坚持从中国自己的国情和实践出发,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创造性地进行经济领域内制度、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前所未有的改革,实现了理论和政策体系上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从而为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滋养并开创了十分广阔的前景,可以说,迎来了我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纵观以上三个发展时期,大致为新中国经济思想 50 年的历史进程画出了一条轨迹。这个历史进程,形象地说,就像一条河流,在经历了起始阶段的蜿蜒曲折之后,正向着东方一泻千里地流去。这是从纵向看,如果从横向看,近 50 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20 年经济思想的发展,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恐怕都是最为活跃、最富于成效的领域之一。这些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内容,在《中国经济思想史

丛书》中,从不同的经济学科角度,给予了具体的阐述。这里须指出的是,丛书中的各分册,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该学科经济思想发展的整体面貌、时代特征、理论成果、代表人物、沿革演变、历史影响、史料价值、研究方法,以及内在的规律性和特点等,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它们既是整个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又是相互区别的独立篇章。就独立篇章而言,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各分册的内容来加以评析,在此不必赘述。而就组成部分来说,除了各分册中或明显或隐喻地透露出来的一些相互关联特征外,还有其他若干共同特征或共同趋势,值得在此加以说明或予以补充。

一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真正确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历史,从个别理论观点来看,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而作为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介绍到中国,则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但直至 30 年代末,才有《资本论》三卷的中文全译本问世。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手中,主要是用作揭露和批判旧社会的理论武器,还很难谈得上用来指导实际的经济活动。另外,1917 年十月革命以后,在不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原本同样落后的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迅速崛起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国人极大的触动和深刻的影响,他们不仅将苏联视为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成功典范,而且激励起从原来学习和仿效西方国家转向学习和仿效苏联的强烈意愿。新中国的建立,使这种意愿变为现实。一方面,在学习的过程中,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

济实际相结合,提出不少值得珍视的理论观点和发展思路,体现了可贵的探索精神。另一方面,在仿效的过程中,又使一些本来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经典理论,逐渐被曲解或凝结成为固定的教条,反过来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使之趋于僵化,以致堵塞了继续探索的前进道路。这些教条在经济理论方面的集中反映,就是所谓苏联范式。即便后来苏联受到了批判,而理论上的苏联范式却被一成不变地继承下来。只有在党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标准的强大推动下,突破这一范式,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才有可能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思想体系。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无论从哪一个领域来看,走的都正是这样一条道路。

二是摒弃封闭或半封闭思维模式,用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之长,来创中国经济思想发展之新。中国自古以来几千年的经济思想,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一直保持着独立发展的态势,很少受到外部的影响。其间北方少数民族的多次入主中原,虽然可能给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注入了一些新鲜内容,但终究未曾改变其基本面貌,反而被这种传统思想所征服。明代后期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看来对传统经济思想的统治地位也没有丝毫的触动。相反,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屡屡禁阻民间商船出海贸易,并对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严加限制,又助长了固有的天朝自大思想。这恐怕也是导致曾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后来落后于世界水平的原因之一。长此以往,在经济思想领域,自然也就习惯于一种封闭条件下的思维模式。直到1840年以后,伴随着外国列强凭借其炮舰打开中国的门户,包括各种西方经济学说在内的外来思潮,才得以涌入中国。但在初期,它们还是受

到国内传统经济思想的顽强抵抗,即使后来这一传统经济思想在与西方舶来经济思想的较量中败下阵来,那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封闭或半封闭思维模式,仍未轻易退出人们的思想习惯,而在暗中作祟,阻碍创新。

例如,20 世纪上半叶,各种西方经济学说充斥于国内,却很难看到运用其中的合理要素结合中国实际来进行经济理论创新的代表作,这既有当时客观条件的局限,也不能否认传统思维模式的掣肘。又如,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将近 30 年时间内,一直受到将马克思的甚至非马克思的经济观点教条化这一倾向的困扰,以致在“文革”中走向荒谬的极端,究其原因,除了西方反华封锁的客观环境影响外,同样离不开自我封闭的主观意识限制。可见,思想上的教条和封闭,是一对孪生子。真正从封闭半封闭的阴影中走出来,对外开放,大胆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丰富并推进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和创新,这是 1978 年以来的解放思想潮流所带来的一个标志性成果。这个发展进程还没有完结,而它所获得的许多理论成就,已经促成了中国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引起了世界经济学界的瞩目和尊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又来到了。

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动中国经济思想领域各学科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大多是以零星而非系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和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状态是相适应的。在这种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历代统治者除了关心维护自身统治所需要的经济利益外,不必要也不可能把经济建设放在国家管理的中心位置上,当然也就难以产生用以解决经济建

设问题的各种系统学说。近代以来,特别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以西方为代表的各类经济学著述大量传入我国,几乎涉及了当时经济学领域的各个学科,给人以目不暇接的新鲜之感。可是,这些舶来的经济学著述,无论学科多么齐全、论述多么系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面对着国家存亡尚且难虞而无暇于经济建设的迫切情势,往往缺乏实践的基础,不过停留在引进介绍的阶段,这样也就失去了继续在中国得以植根利用的土壤。因此,整理和总结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如果仅仅着眼于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无异于将西方经济学说重新复述一遍。

新中国建立之初,曾把经济建设放在突出的地位,从而也带来各经济学科的活跃发展,并为以后各学科自成体系地独立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奠定了一个基础。可惜这个形势未能持续下去,经济建设的重点地位不久又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取代,接踵而至的更是对所谓单纯生产观点的讨伐。结果,各经济学科的发展,不仅因受到遏制而沉寂下来,还逐渐趋于萎缩。这一局面的改变,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力挽狂澜,明确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为了适应和满足经济建设中心的需要,不仅原有的经济学科重新焕发生机,而且大量新的经济学科应运而生。《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的分册选题,目前多系一些传统学科,主要考虑到它们有着贯穿 50 年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补充了许多新的内容,同时可以预期,近年来突破传统学科局限而涌现出来的各种新兴学科,一俟比较成熟,也将成为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许会纳入本丛书的未来发展计划之中。

四是扬弃历史传统,在不断创新中体现中国经济思想

发展的民族特色。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进程,显示出继承与发展、传统与创新相互交错的辩证关系。否定传统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忽视发展和创新,历史传统则会趋向保守落后和导致停滞不前。早在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过程中,诸子百家的相互论辩,已经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传统内容大致划定了一个范围。此后两千年间,传统思想的发展演变,很少受到外力的干扰,基本上沿着自身的轨道或缓或速地向前推进。在这样漫长的历史时间中所积淀起来的思想传统,是不可能挥之即去的。因此,当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打断了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这一进程后,面对蜂拥而至的西方经济常识和经济理论,原先经济思想中的那些传统观念或意识,或者遭批判,或者被改造,或者得到新的利用,但不管怎样变化,传统思想中的一些基本要素,仍以各种形式被保留下来,而且这些传统要素的历史积淀越深,它们的持久影响力也就越长。新中国的建立,在经济思想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延续了这一改造历史传统的过程,而且来得更为深刻。特别是近 20 年来,经济思想领域的研究成果面目一新,无论是思维方式、逻辑体系、理论概念、研究方法等,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乍一看,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似乎历史传统已经消失得全无踪迹。其实稍加考虑,这一经济思想既不同于书本中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翻版,它具有着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而这种民族特色,不仅建立在中国今天的现实基础上,而且也建立在中国昨天的历史传统基础上。只不过这个历史传统决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借鉴吸收各种外来经济学知识和立足本国经济实践的创新过程中,不断得到扬弃。

比如,曾经长期支配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一些流行观念,像重义轻利、重本抑末、崇俭黜奢等,进入近代以后,相继遭到许多有识之士的批判,被指为阻碍新兴经济发展的三大封建教条。显然,这些观念之所以成为教条,就在于它们墨守成规,以致沦为封建社会后期经济长久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这些观念作为历史上的产物,也不是凭空而生的,它们的形成自有其客观基础,否则就不会在千百年间一直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进而言之,这些后来被当作教条的观念,剔除其糟粕,其中可能包含着若干合理成分,而这些合理因素以其历史传统的深厚底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包括在新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仍然会发挥其潜移默化的作用,并构成我国经济思想区别于他国经济思想的民族特色的来源之一。像重义轻利论,其讳言财利部分,一般被认为是妨碍古代经济思想继续发展的一个绊脚石,而义利观本身,强调伦理道德与经济行为的相互关系,至今仍是新中国经济思想须不断加以探讨的严肃问题。重本抑末论主张用抑制或打击工商业的办法来加强或突出农业的重要地位,这除了在新兴封建地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时期曾有其现实意义外,早已成为钳制工商业发展的不合时宜的陈腐观念;然而本末论中所体现的以农业为本源的思想,在今天重视农业基础地位的国策思想中,仍不难发现其中一脉相承的传统联系。至于崇俭黜奢论,尽管我国古代早就出现过在特定条件下提倡奢侈消费以振兴生产和扩大就业的个别观点,却从未形成气候,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一些顽固分子倚仗崇俭黜奢观念来反对仿效西方建立新式工商业,俭奢论才遭到人们的唾弃;不过,时至今日,崇尚节俭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并对我国的经

济生活产生着独特和深远的影响。又如,先秦儒家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长期为人们所奉诵,要破除这种司空见惯的传统思维模式,实属不易。建国以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观念阴魂不散,并且在“文革”期间发展到它的极端,便是明证。这是从宁可放弃生产发展和财富增长,也要保证现有财产平均分配的传统涵义上,去分析它的弊端。如果换个角度,从这一思想所侧重的“患不均”观念来看,它也曾古代的封建等级制度下,鼓励过人们向往和追求分配上的均平理想。而且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提出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未尝就没有这一传统的均平思想可资借鉴。这里所引的例证,哪怕回顾起来似乎是些比较消极的观念,经过历史的扬弃,尚且嵌入今天的经济思想之中,更何况那些历史遗产中的精华和积极部分,如富民、理财、轻税、小康、大同等等,更是为今天的经济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它的民族烙印。

以上这些特征,或许还能举出更多类似的特征,不拘于本丛书各分册的具体内容,而是试图从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考察新中国经济思想究竟“新”在何处,或者说,它比它的前辈们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开辟了哪些新的方向。由此也可以看到,我们为迄今为止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史所划分的三个时期,在确立或体现这些特征方面所处的历史地位,是不尽相同的。第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开创和初步尝试的时期,第二个时期则是反复和停滞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才是真正发展的时期。同时,这三个时期又是一个相互连结的整体,没有前者很难预料后者,而后者的发展又是前者的合理归宿。当然,新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并没有完结,展望未来,甚至还可以说这只是一个开端。但值得珍视的是,



它已经开辟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前途是无限光明的。这样,它不仅积累了50年的丰富经济思想史料可供分析,而且摸索出了一条体现中国自己特色的经济思想发展道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整理新中国的经济思想,条件已经成熟了。

50年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在数千年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然而,这50年尤其是近20年获得的成就,在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向前发展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却是鲜有其匹的。积之愈厚,发之必速。如果追溯起来,近20年来的理论经济以及各分支经济学科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其功绩离不开前30年的探索和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借鉴;而50年新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又离不开1919年至建国前夕30年间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作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至于五四运动至今80年中国经济思想的进程,也不能否定此前从1840年到1919年的近80年间向西方学习的先行思想铺垫作用。这样算起来,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经济思想成就,有着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50年、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80年,乃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160年的历史积蓄。如此深厚的沉淀,才能在近20年的不长时间催发出令世人赞叹的璀璨成果。从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看,恐怕也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才能与之相媲美。胡寄窗先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曾经满怀信心地预测,中国人民“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对世界经济学说做出自己的新的贡献”^①。

^① 见胡寄窗先生1990年10月为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一书所写的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此言不虚,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更为这一预测提供了让人信服的佐证。

《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目前由经济学基本理论、财政思想、金融思想、工业经济思想、农业经济思想、贸易思想、统计思想、会计思想、经济史学发展等专题分册组成,与此前已经出版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以下称《纲要》)一书,在编目的分类上,大体一致。但从内容上看,丛书中将相继出版的各分册,比起《纲要》,无疑会更加丰富多彩和具有学术研究价值。一则各分册研究的历史下限,肯定要超出《纲要》以 1989 年为界的限制而往后延展,从而将增添许多新的重要资料。二则各分册的研究不受统一体例的约束,可以结合各学科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点。三则各分册作为独立的学术著作,无论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还是对问题的分析钻研,都将更为充实、深入和缜密。

值此新中国建国 50 周年之际,我们愿把这套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以求教正。

谈 敏

1999 年 4 月

序

治史不易，研究近代史尤难。何况研究思想史！所以，鲁迅曾发出“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之感叹（《且芥亭杂文·实〈小学大全〉记》）。如今时过境迁，改革开放已为我国知识分子营造了潜心研究学术的春天。鲁迅当年的顾虑不复存在了。但要写“新中国会计思想史”这样一类当代的专门思想史，难度还是很大的。问题不在于资料的搜集，而在于分析评价。一则50年来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十分曲折复杂，线条不易理顺；二则在这一学术领域有不少活见证仍然健在。他们身历其境，不少人参与并推动了我国会计理



论的发展。如何评价不同人物、不同著作、不同立论,往往见仁见智,不尽相同。所以,会计学者要写此类史书,难免望而生畏!

令人十分欣慰的是,我国年轻会计学者、上海财经大学陈信元教授,以非凡的勇气,不畏艰险,敢于攻克会计科学中的难关。他和他的研究生金楠同志,搜集了大量的史料,运用了科学的方法,加以分析概括,论证充分,评价公允,要言不烦,以相当简练的文字写出了《新中国会计思想史》一书,实属难能可贵!

研究历史(包括思想史),首先要解决历史分期问题,研究会计理论发展史也不例外。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其中“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十年动乱,不但中断了会计理论研究,而且几乎扼杀了会计这一管理经济所必不可少的手段。改革开放才为会计和会计理论的大发展带来勃勃生机。本书作者尊重史实,结合编年,把50年来的会计理论发展分为“初步形成”、“停滞发展”、“全面发展”和“深入发展”四个阶段。我认为是相当恰当的,也是具有新意的。

在每个历史发展阶段,本书都交代了各该阶段会计理论的“发展线索”和“研究特征”,并把每个阶段所探讨的重点、代表性著作、代表人物及其观点穿插其中。使人感到,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特定的研究内容,又有贯穿建国以来我国会计思想发展的一条总的脉络。史与论,事与人,能恰当地加以结合。这是写思想史最难做到的。本书对此的处理则令人相当满意。

自古文人相轻,不同的学术观点常有门户之见。在评价一个学派、一种观点时,很易有所偏颇,而有失公允。这乃是